

李大钊年谱

许毓峰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

李大釗年譜

許德珩題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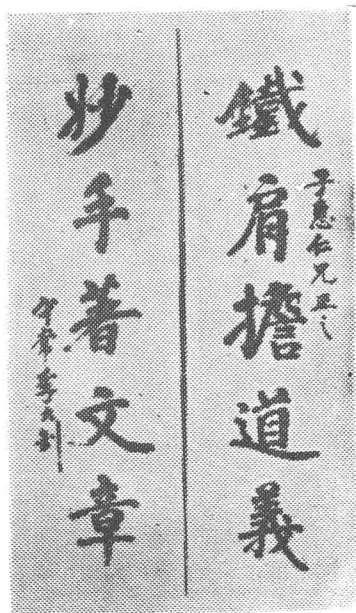
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日



李大钊烈士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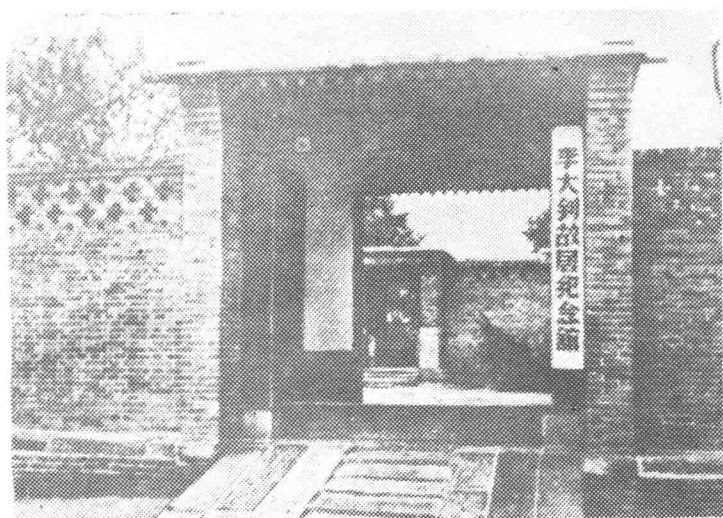
在日本留学时的李大钊同志



李大钊同志题赠友人的对联手迹



一九二四年一月，李大钊同志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与孙中山先生步出会场。



李大钊同志故居



李大钊烈士汉白玉雕像

李大钊年谱

一八八九年（清光绪十五年己丑） 一岁

李大钊字守常，乳名憨头，初学名耆年，字寿昌，号龟年（后改名大钊），公历十月二十九日（阴历十月初六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城东南二十五里大黑坨村的一个小康家庭里。

故乡地处冀东平原的东南端，濒于渤海，东靠改道前的滦河。村南的土地叫南河滩，村东的土地叫张家滩，村东北一带的土地叫流水港，向北可以瞭望到昌黎的碣山，在旧社会这里是十年九涝的地方。

曾祖父李为模兄弟三人：两个哥哥叫李为栋、李为枢，都是农民。祖父辈也是兄弟三人：李如珍、李如珠、李如璧。

祖父李如珍，光绪年间，曾在东北长春、万宝山一带经营杂货铺，冬天到关外去，次年春天回来，辛辛苦苦积蓄几个钱，在家买地数十亩，后因在关外挨红胡子绑架受了惊吓，乃停止经商，在家务农。因无子，乃将他二弟李如璧之次子李任荣过继为子。

父李任荣（字华亭）生于一八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同治六年阴历四月二十六日），是个读书人，十九岁进学，为清末邑庠生。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乐亭县发生地震，因背母出屋外跑，口吐鲜血，从此得肺病不愈。一八八九年四月（阴历三月）病故。享年二十三岁。（1）

母周氏，生于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阴历十二月二十七日）。父亲死后七个月生大钊同志。俗称墓生，即遗腹子。〔2〕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 三岁

三月七日（阴历正月二十七日），母周氏逝世。享年二十七岁。〔3〕

祖父年近七十，因过继儿子及儿媳相继少亡，乃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他对孙儿非常宠爱，他亲自用光头饽饽、高粱米粥一口一口地喂他。〔4〕也常抱着孙子在院内散步，一边走，一边哼着小调：“为人不要当和尚，和尚是个大孽障……”。这样，他在祖父的怀里，在催眠歌中，慢慢地睡着了。〔5〕

一八九二年（光绪十八年） 四岁

祖父对他管教非常严厉。嘱他不要骂人和打架，怕孩子接触到社会上的“邪恶”，不让他到外边去玩，把他关在家里，祖父亲教他认字。〔6〕

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 六岁

在祖父的教育下，已认识不少字，门口的对联，街头的告示，已能念下来。不久，又开始读《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 七岁

祖父送他到本村（大黑坨）西头谷宗海家的私塾里从单

子鳌就读，塾师为他起学名耆年，字寿昌。读些“四书、经、史”之类。他在同学中年龄最小，学习最好。单子鳌常对别人说：“我教了一辈子书，生平最得意的学生，就是李耆年！”〔7〕

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 九岁

从单子鳌就读，有一天，雪下得很大，自家的黑狗、白狗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身上都盖满了雪。大钊同志本想出去玩雪，祖父却让他在室内对景作诗。他读过张打油的打油诗，便利用打油诗的句子，随口诌了出来：“大雪纷纷下，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地上露出个大窟窿。”爷爷问：“大窟窿是什么？”大钊同志答：“是井。”爷爷连口称赞作得好。〔8〕

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 十岁

在大黑坨读书期间，勤奋、刻苦，进步很快。单子鳌乃向他祖父提出：“耆年的学业良好，我已教不了他，还是另请名师吧！”〔9〕

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 十一岁

祖父母因家庭人手少，给他娶了本村姓赵的女儿赵纫兰（十七岁）为妻，〔10〕二人感情很好，夫人为人贤惠，辛勤操持家务，服侍老人，帮助大钊同志。

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 十二岁

九至十一月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又分兵四路扩大

侵略：向东攻占了北京至山海关沿线地区，占据了昌黎、滦州等地；向西侵入山西；向北侵占张家口；向南进犯保定一带。大钊同志亲眼看到侵略军对中国人民的蹂躏，也看到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打下极深的烙印。从此，他对旧政府十分痛恨，常和几个较亲密的同学谈些如何改革旧社会的问题。他也常问老师：“为什么洋人在中国横行霸道？”“为什么穷人没饭吃，没衣穿？”问得老师无言以对。(11)

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 十三岁

到小黑坨张老恭家所设专馆，跟秀才赵魁斗读书，赵老先生很喜爱其聪明伶俐。(12)

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 十四岁

是年适科举考试，应试未取，祖父安慰他说：“那有什么不痛快，再念，再考！”(13)

不久，又到井家坨的举人宋某家从黄玉堂就读，读书更加刻苦努力，全塾学生二十余人，夜间别人均睡，他常读书至半夜。黄玉堂的妹妹多少年后尚回忆说，他哥哥当时一回家就说：“有个学生，叫李贻年，念书念得特别好！”(14)

有一天，黄玉堂老师给他讲太平天国的故事，他听后激动地说：“我长大了一定要学洪秀全，推翻清朝皇帝！”所以他决心发愤读书，寻求救国救民的良策。正如他自己回忆的：“自束发受书，即矢志致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狱中自述》）

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 十六岁

仍在家乡私塾读书。他才思敏捷，手不释卷，以能文善诗，著称乡里，至今在家乡传为美谈。

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 十七岁

农村经济日益破产，人民生活困苦异常。大钊同志在夫人赵纫兰的帮助下，卖掉薄田数亩，考入永平府（今河北卢龙县）中学校读书。

在校读书不懈，除学习基础科学课外，并开始学英语。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课余热烈搜寻宣传新思想的书刊，贪婪地阅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是全班有名的好学生。

他也常与要好的同学谈论国家大事，表现了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怀。

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 十九岁

八、九月间，祖父病重，收到家信后，急忙回家。一天夜里，祖父忽然睁眼对守在身边的孙子喃喃地说：

“我死了，千万不要大发送。人死了没有什么，气是清风肉是泥，埋了拉倒，把省下来的钱留着给你念书。你一定要好好念书，千万不要把书扔掉！”说罢停止了呼吸。（15）

祖父去世后（年逾八旬），家中仅剩的一点财产，被老捡姑母和一个本家叔叔借出殡挥霍殆尽。家境日益贫困，大钊同志原想到通都大邑继续求学，这时却面临失学威胁。就在这时，井家坨的财主宋举人表示愿意资助他，但被大钊同

志拒绝。他后来对表姑说：“宋某做官来的钱不正，这些人的钱都不是好来的，我就是不念书，也不用他们的钱！”他“感于国势陵夷，慨然起研究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狱中自述》），依靠夫人的支持，“辛苦艰难，典当挪借”，（《狱中自述》）以维持学业；但不等中学毕业，就要到天津投考别的学校。

夏，大钊同志与三个同学来到天津。当时，天津有三个学校正在招生：一是北洋军医学校，一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一是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大钊同志认为“军医非我所喜，银行亦违我素志，故皆决然弃之而入法政”。（《狱中自述》）遂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但是，上学要由其夫人典当维持，深感为难，在此矛盾心理下，写信给大伯父李任元，说明自己的志愿与想法。其伯父鼓励他上学，立即回信说：

“你要逛山就逛高山，你要游水就要游大海。应继续学习深造。”

于是，他克服了矛盾心理，摆脱了家庭困难，进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6〕并改名大钊。〔17〕

在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期间，除学习法政诸学科和英语、日语外，还阅读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十八世纪法国卢梭的著作，以及十九世纪欧洲宪法与民主方面的理论。比较广泛地接触了当时的所谓“新学”（当时，资产阶级文化所谓“新学”与封建文化所谓“旧学”正在斗争），增进了他对社会现实有较多的了解，激发了他对国家政治和人民命运的关注，开始树立民主主义观点。

在学习期间，生活极为困难，为了自食其力，常向报刊

投稿卖文，以资补助。

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 二十岁

继续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

作《登楼杂感》二首。这是作者留下来的最早的诗篇。

光绪和慈禧相继死亡，溥仪继帝位。

一九〇九年（宣统元年） 二十一岁

继续在天津法政专门学校刻苦学习，积累知识，追求真理，焕发了革命爱国思想，确立了救国救民的宏伟抱负和坚强决心。

八月，鲁迅由日本回国，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

十月，立宪派人士经各省督抚选为议员，他们利用合法地位，联合发动请愿运动，要求迅速开国会。

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 二十二岁

大钊同志所在的法政专门学校，在辛亥革命前已有革命党人进行活动，该校史地教员白亚雨就是同盟会京、津、保支部的重要成员，他学识渊博，待人热情，团结革命青年进行斗争。他的革命思想，对大钊同志影响很大。

十一月间，天津学界要求政府开国会，法政学校举行罢课，当与白亚雨商量时，他说：“与虎图皮，庸何济乎！”终由于清政府的欺骗，这次罢课未能达到预期的结果。〔18〕

山东、湖南、云南等地，都发生规模较大的暴动。

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 二十三岁

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爆发，促进了民主精神的高涨。民主革命的浪潮也激荡着北方。这时，白亚雨奔走于京、津、滦州、张家口一带，从事运送军火，联络军队等活动，终于十一月十六日与营长王金铭、施从云发动了滦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均被捕殉难。白亚雨英勇不屈，从容不惧，立而不跪，昂首宣称：“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杀则杀耳，何迫辱为！”遂英勇就义。（19）

大钊同志对其老师白亚雨异常尊敬，多年后在其所写《旅行日记》（载1917年5月9—11日《甲寅》日刊，署名守常）和《五峰游记》（载1919年8月31日《新生活》第2期，署名孤松）等文章中仍悼念不已。

一九一二年 二十四岁

一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正式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并决定一九一二年为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孙中山又提出辞职。三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为袁世凯窃取，北洋军阀黑暗统治从此开始。

大钊同志，确实对辛亥革命表示过极大的热情，曾幻想从此可以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但是，不久他的幻想破灭了。他深深感到，辛亥革命只赶走了一个皇帝，仍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并没有完成，对此非常愤慨，对祖国的命运表现了深切的关怀。他在沸腾的政治生活中看到新的共和国的“隐忧”，故于六月写了第

一篇政治论文《隐忧篇》（但至一九一三年《言治》月刊第一年第三期才发表）。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边忧”、“兵忧”、“财困”、“食艰”、“业散”、“才难”等六忧。他从隐忧之中，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失败，他看到自己的祖国如“敝舟深泛溟洋……固犹在惶恐滩中”。

冬，他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曾去北京与一些政界人物进行接触，但看到的却是官僚政治的黑暗。他也同北京社会党的负责人陈翼龙有过交往，可是该党在江亢虎影响下的政治投机倾向，也使他感到失望。以后陈翼龙也被袁世凯杀害，社会党总部和支部均被迫解散。（20）

一九一三年 二十五岁

三月，袁世凯派人在上海暗杀了准备进京活动组织“责任内阁”的宋教仁。这使大钊同志进一步认识到，革命果实已被反动军阀袁世凯篡夺。富强的国家，幸福的生活，不可能在反动军阀政权下实现，他要把自己内心的哀痛向社会大声疾呼。

当时，他在学校担任着北洋政法学会编辑部的部长之一，负责主编《言治》月刊。他在四月一日出版的《言治》创刊号上，发表了《大哀篇》。

他在这篇文章中，尖锐地抨击了窃国大盗袁世凯和一些官僚政客：“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傲岸自雄，不可一世”，而广大人民群众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并没有给人民带来丝毫的自由和幸福，“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狴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狴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狴者掠夺之幸

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大钊同志并以极其愤怒的心情指出：“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

在《言治》月刊的同一期上，还发表了旧体诗《岁晚寄友》一诗云：“慷慨思投笔，艰难未去师。”〔21〕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在天津求学时，虽自己生活极端贫困，但一见别人困难时，仍要尽力相助。有一天，他领到稿费二十元，在回校途中，见一老人病卧路旁，他就将全部稿费送给这位老人，并托该段警察对这位老人予以照料，让他平安回家。〔22〕

五月，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学校当局从毕业生中选了三人送往日本留学，其中就有大钊同志。〔23〕当时，有一位孙洪尹对大钊同志的学识才力很佩服，把他介绍给汤化龙（进步党），汤化龙对他的才华很器重，于是帮助他到日本去留学。〔24〕

六月，袁世凯通令“尊崇孔圣”，“举行祝孔典礼”，为复辟帝制制造反革命舆论。

七月一日，大钊同志以《筑声剑影楼剩稿》为题，在《言治》月刊第四期发表了《登楼杂感》、《哭蒋卫平》。“筑声剑影楼”是作者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自用的斋名。筑声，出于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的故事。表现了当时大钊同志忧国忧民，立志要推翻反动腐朽的统治者的愿望。

七月十二日，孙中山在南方发动“二次革命”，举兵讨袁，结果被袁世凯军队打败。孙中山流亡日本。

大钊同志对讨袁失败感到痛心。在此期间写了不少忧国忧民的诗篇。如：吊《圆明园故址》二首（后发表在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一日出版的《言治》月刊第六期），他怀着悲愤的

心情，发出“圆明两度昆明劫”的慨叹，有力地谴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和清王朝卖国投降的反动政策。《咏玉泉》也是在同一期的《言治》月刊上发表的。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只今犹听宫墙水，耗尽民膏是此声。”他愤怒地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剥削人民、挥霍无度的罪恶行径，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另外《有感》一诗，也显示了诗人伤时忧国、“愁尽人天”的心情。决心钻研政治、经济学来拯救祖国。

袁世凯打败了孙中山发动的反袁武装后，更加独裁专制，排斥异己，迫害人民，大钊同志乃暂离北京，返回故乡，准备去日本。

九月，在回乡的往返途中，与同学子默又到昌黎县城北的碣石山〔25〕作旧地重游。这一次游遍了五峰山和附近各处，他跑到“望海峰”去看大海，最感赏心悦目。特别看了水岩寺和玉液池，并从碑文上研究了明末范志元将军扼守昌黎城，抵抗清兵入侵的历史，且向当地群众了解清兵入关时人民坚守昌黎城进行英勇斗争的事迹。因即将出国，家中事务需要处理，便留子默在此，一人回家。回来后又与朋友在五峰山继续游览，在韩昌黎祠逗留了十余天。〔26〕

九月十一日夜晩，遇到横行霸道的日军在昌黎铁路线上杀死我国路警五人的惨案。对日本侵略者敢在中国土地上随便残杀中国人民，感到无比愤慨。他以极端痛恨的心情记述了这件惨案：“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首阔步于中华领土，以戕我国土”；“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他向全国人民强烈呼吁：“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并说：“山盟海誓，与日寇不共戴天，就象那块碣石一样。”〔27〕这

更增加了他挽救民族危亡的决心。从故乡回天津不久，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新出版的反动书籍《支那分割之命运》。他“怵于亡国之痛”，立即与北洋政法学会同人将它翻译出来，并逐章逐节予以驳斥，写成有名的《〈支那分割之命运〉驳议》一书，十二月出版。该书“字字皆薪胆之血泪……欲为国人当头之棒，警梦之钟。”〔28〕该书出版后，风行全国，激发了“中华男儿，有奋起雄舞之志。”

十月，袁世凯以军警包围国会，迫使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

十一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对革命党人进行残酷镇压。中华民族又遭受深重灾难，劳动人民仍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国运艰危，出国东渡的前夕，大钊同志又写了《南天动乱，适将去国，忆天问军中》一诗（按：天问即郭厚庵，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职员），表达了对参加讨袁军友人的希望。

大钊同志也很注意文学方面的问题，他在十一月发表《文豪》一文，他认为在这种混乱时代中，文人应该多写一些鼓励性和指导性的文章，以启发人民的革命积极性，不应有着厌世的情绪。

从本年四月至十一月，他发表诗文二十余篇，在这些诗文中，表达了强烈的爱祖国爱人民的思想感情。〔29〕

冬，大钊同志为了寻求救国的真理，与同学郭须静等东渡日本留学。当乘船过黄海时，看到落日狂涛，一碧万顷的景象，他追念起在甲午中日战争中那些为国殉身的爱国志